

民權、政權、國權

——辛亥革命與黑龍會

• 王 柯

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革命家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國家」思想的影響，在實際生活中也與許多日本人關係密切。許多日本人為辛亥革命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這些日本人的活動背景上，有沒有日本「民族國家」思想的痕迹？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然而中國的「近代」卻選擇了一條建設民族國家的道路。因此，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實質性問題，就是如何解釋「民族」與「國民」之間的關係。在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人首先意識到的民族是「漢」與「滿」，而不是在內涵上可以與「國民」部分一致起來的「中華民族」。中國之所以選擇走民族國家的道路，首先是與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所面對的國際局勢有關。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面前，為了保衛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就不能不說明國家疆界所在^①。按照「民族」的範圍確定國家疆界的想法，卻是受到了自稱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的影響^②。

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革命家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國家」思想的影響，在實際生活中也與許多日本人發生過非常密切的關係。眾所周知，許多日本人大力支持了他們的革命活動，甚至直接加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為辛亥革命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是，這些日本人的活動背景上，有沒有日本「民族國家」思想的痕迹？中國革命家之所以選擇了走建設民族國家的道路，與這些日本人支持中國革命之間有無關係？反言之，這些日本人之所以理解和支持中國革命，與中國革命家選擇走民族國家道路之間究竟有無關係？如果以上問題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那麼這些日本人在中國革命家選擇走建設民族國家道路的問題上究竟扮演了甚麼角色？釐清這些問題，就可以明白這些日本人究竟是何種人士，出於何種目的來支持一百年前發生的那場中國革命。這對於幫助我們加深理解辛亥革命的性質以及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應該具有一定的意義。

一 日本黑龍會與「革命的搖籃」

1916年6月，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大陸浪人^③團體「黑龍會」的最高首領、代表（有時又稱「主幹」）內田良平以其個人名義，秘密地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篇手寫的〈對支私案〉，其中有這樣一段畫龍點睛之語^④：

將支那本部置於共和政體下，以國民黨或國民黨系中有德有力者為執政；再分割滿蒙及西藏三地委託於宣統帝進行統治，同時將其變成日、英、俄的保護國並在一定程度上對英、俄兩國的保護權進行限制；從而使〔日本〕帝國居於實際掌握全部統轄權的地位，此即本私案之梗概。

〈對支私案〉的主題，就是要分裂中國，這與內田良平以往的言論一脈相承。1913年以來，他以黑龍會名義就日本的中國政策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不少報告，其中尤以〈對支問題解決鄙見〉最為有名。此份報告中提出的中日《國防協約私案》，事實上成為日後「二十一條」的藍本^⑤。然而，〈對支私案〉在說法上卻有讓人耳目一新之處^⑥：

如果說要國民黨或國民黨系掌握政權，就要以形成一大親日潮流為要。如果舊約法時代約佔當選議員總數七成的國民黨一流人物有可以被看做是親日派的理由的話，欲於將來進一步扶持親日勢力，最妙的就是讓該黨中有德有力的黃興等成為新政府的首腦人物。如果滿蒙及西藏的處分方案得到實現，這樣〔中國〕就可以減少領土被分割之虞，還不會傷害到英、俄兩國的利益，帝國的勢力也因此得以擴充，並且毫無疑問能夠在指導民國方面得到方便和增添威力。同時對於民國來說，不僅可以因此一舉得以有效轉用全部的前朝優待費，同時民國政府也才可以名副其實得到實現完全統一之利益，何況這也能讓革命的目的之一、即興漢滅滿的宣言得到真正實現。我堅信自己的這一私案實為鐵定的最合適宜的對支政策，因此希望諸公能夠在斟酌之後快刀亂麻一斷了之。

1916年6月，黑龍會的最高首領內田良平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篇〈對支私案〉。在主張分裂中國的事情上，內田良平之所以敢說得如此肯定、具體，與他以及黑龍會勢力長期以來一直與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中國革命派之間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有關。

在主張分裂中國的事情上，內田良平之所以敢說得如此肯定、具體，與他以及黑龍會勢力長期以來一直與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中國革命派之間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有關。孫中山1897年8月第二次來日，9月中下旬結識了宮崎滔天和平山周等日本大陸浪人。9月27日，孫中山通過平山周的介紹，與同大陸浪人有着密切聯繫的政治家犬養毅見面。平山周又經過犬養毅的介紹，從眾議院議員平岡浩太郎那裏，為孫中山拿到了在日的生活費用^⑦。平岡浩太郎曾是日本大陸浪人的重要母體、位於福岡的玄洋社的第一任社長，與頭山滿、箱田六輔同稱為「玄洋社三傑」，日後為了支撐玄洋社的對外活動而開始經營礦山，並進而進軍政界。內田良平即是平岡浩太郎的外甥。此次孫中山在日本生活了一年有餘，在此期間中國國內戊戌變法失敗，日本大陸浪人參加了救助戊戌變法領袖的活動，宮崎滔天和平山周分別陪同康有為和梁啟超由香港來到了日本。他們也曾極力促成保皇黨與革命黨聯合，但遭到了康有為的拒絕。孫中山此次在日本期間，結識了許多對中國政治問題感興趣的日本政界和財界人士，也包括玄洋社的精神領袖頭山滿以及內田良平等日本的大陸浪人的頭目^⑧。

因甲午戰爭之後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這讓具有國權主義思想的日本大陸浪人極端仇視俄國。內田良平等人於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以後紛紛渡俄，以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為據點，通過開設柔道道場並利用日本妓女來接觸俄國軍官等方法，觀察俄國實力、盜取俄軍情報和分析俄國對清國政策

動向，並與日本軍參謀本部所派出的偽裝成京都西本願寺符拉迪沃斯托克別院僧侶的諜報人員花田仲之助中佐^⑩、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田村怡與造等相互配合，直接偵察俄國駐軍情況^⑪。內田良平1898年從俄國回到日本後即提出了「對俄必戰論」，鼓吹日本應該率先對俄發動戰爭。正是在這年秋天，經宮崎滔天介紹，內田良平結識了孫中山。孫中山希望內田良平支援他發動革命，內田良平則告訴孫中山，「支那革命」的先決條件應是日俄開戰，不然俄國就會趁亂掠奪中國領土。孫中山告訴他：「支那革命」倘若成功，恢復被俄國所侵佔失地當為易事，何況還有「日支提攜」掣肘俄國。於是，內田良平告訴孫中山：如若中國革命發動在先，他即停止對俄計劃，首先支援孫中山的行動^⑫。

1900年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時，的確得到了宮崎滔天、平山周以及內田良平等日本人的積極援助。然而，按照內田良平等人日後的解釋，當年他們之所以投身於中國的革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孫逸仙等人的革命思想以滅滿興漢為標誌。漢民族的革命成功了，成為失敗者的滿洲民族只能將自己的衰殘命運託付給北方的故鄉滿洲，自然就要依賴俄國，這時我國就可以與革命成功了的新支那互相提攜以對付俄國的南下政策，從而席卷滿洲與西伯利亞，將這些地區置於我們的勢力範圍之中，因此確定東亞大勢，將我皇德遍照大陸之地。這種做法可以在拯救東亞危局的同時擴張我國國勢。我們東方志士正是能夠從這種大的視野出發，所以才開始參加籌劃支那革命。愛國與義俠的兩種精神的結合，讓我們的心臟開始在清國南部躍動」^⑬。也就是說，日本大陸浪人之所以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是在將東北地區最終納入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目的驅使下開始的；之所以讓他們能夠看到這種可能性的，就是中國革命派所提出的「滅滿興漢」的政治主張。

日本大陸浪人之所以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是在將東北地區最終納入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目的驅使下開始的；之所以讓他們能夠看到這種可能性的，就是中國革命派所提出的「滅滿興漢」的政治主張。

惠州起義失敗以後，內田良平再次埋頭於挑動發起日俄戰爭的活動之中。1901年2月，他發起成立了日本的大陸浪人組織黑龍會，其宗旨為：出於東亞的大局和帝國的天職，為了防止西力東漸和經綸東亞，與俄國開戰並將其趕出東亞，在此基礎上將滿洲、蒙古、西伯利亞變為一團，從而打下經營大陸的基礎^⑭。這個組織之所以取名為「黑龍會」，就是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要建設一個以流淌在滿洲和西伯利亞之間的黑龍江為中心的「經營大陸的大業」。內田良平被推為黑龍會的主幹，黑龍會的本部就設在當時位於東京市芝區西久保巴町的內田良平家中。黑龍會的主要成員多為玄洋社出身，初建時的第一批會員中，除了內田良平外，深得孫中山信賴的平山周和深得黃興信賴的末永節也在其中。內田良平此後一直是黑龍會的最高首領，頭山滿後來受到邀請就任黑龍會顧問，對黑龍會的決策產生影響，但是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他並不是黑龍會的正式成員^⑮。

1905年7月，孫中山由法國再次來到日本東京，此時也是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節節取勝的時期。在宮崎滔天等人的介紹下，孫中山與留日清國學生中具有革命思想的黃興、宋教仁等人先後取得聯繫，決定合併興中會（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光復會（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與華興會（黃興、宋教仁、陳天華），於7月30日召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後為避免日本政府反對，改名為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籌備會議的會址就是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赤阪區檜町的住處^⑯。

參加會議的除了以留學生為主的七十位在日中國人之外，還有宮崎滔天、內田良平和末永節三位日本人。前已述及，內田和末永就是黑龍會的成員。更加重要的是，這次會議確定了同盟會的名稱、宗旨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入會誓詞，並由孫中山帶領出席會議者宣誓入會。據說當天因為來人太多，內田良平家的地面都被踩塌了^⑥。8月20日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後，頭山滿、犬養毅、平岡浩太郎、內田良平、宮崎滔天等人又成立了「有鄰會」，從財力和人力等方面支持同盟會^⑦。

因為以上種種關係，黑龍會稱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後的這一時期為「支那革命黨的搖籃時期」^⑧，言外之意不言而喻：這種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中國革命，就是在日本由他們這些所謂的「東亞先覺志士」所哺育的。

二 大陸浪人之「大陸經營」與辛亥革命

1911年武昌起義發生後，宮崎滔天、平山周、末永節、萱野長知、北一輝^⑨等與黑龍會有着緊密關係的大陸浪人紛紛趕來，通過他們與革命黨核心領導人物之間的關係，參與了辛亥革命的各種活動。宮崎滔天跟着陳其美（當時孫中山尚未回到國內），末永節、萱野長知跟着黃興，北一輝跟着宋教仁；而在日本國內與這些進入革命領導中樞的日本大陸浪人進行聯繫的，主要就是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這從宮崎滔天、萱野長知和北一輝在給日本國內發報時總是將內田良平放在收電人首位就可以看出。內田良平利用他與日本國內各界的關係，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和陳其美等人的要求，積極籌措軍火和資金，有力地支援了革命軍。例如，內田良平11月25日就向到達上海投入陳其美陣營不久的宮崎滔天發電報，告知他可以用非常低的價錢購買到外套15,000套、絨毯4,000張，並詢問這些物資對革命軍是否可以派上用場^⑩。

內田良平支持辛亥革命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三井銀行借款。1911年12月12日上午，內田良平給上海的北一輝發電：「昨夜原口^⑪電報所談之事，實為費盡苦心方成之事，時機不可放逸。」而在當天下午，宋教仁和陳其美即回電委託內田良平為宋教仁、陳其美、伍廷芳和李平書的代理人，辦理以「年利7分」從三井銀行借款30萬元事宜，包括締結契約和接受現金^⑫。1912年1月25日下午，內田良平給北一輝發電報告知：可以借到30到50萬，但年利為「8分5厘」，手續費10%，不需擔保或以革命軍軍票擔保，債務人為孫中山、黃興和宋教仁。宋教仁當夜回電，對內田良平為借款30萬成功所付出的巨大辛勞表示深深感謝，並告知將有人送去15,000元，「雖然很少，但請作為外交及其他活動費收下。」^⑬與此同時，內田良平還接下了為革命軍輸送武器的工作。1月25日下午，北一輝給內田良平發報，請他幫助檢查利用三井銀行借款通過三井、高田和大倉等日本商社購進的武器，而內田良平則立即找來日本軍人幫助一起前去檢查武器質量^⑭。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立即聘請多位日本人為政府顧問，包括聘請內田良平為外交顧問，這也是對他多年來支持中國革命功勞的肯定。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非常希望日本政府能夠率先承認剛剛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1月下旬即開始計劃派遣宋教仁到日本進行活動。而他們

因為與中國革命黨人種種關係，黑龍會後來稱中國同盟會成立前後的這一時期為「支那革命黨的搖籃時期」，言外之意不言而喻：這種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中國革命，就是在日本由他們這些「東亞先覺志士」所哺育的。

內田良平利用他與日本國內各界的關係，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和陳其美等人的要求，積極籌措軍火和資金，有力地支援了革命軍。內田良平支持辛亥革命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三井銀行借款。

找到的日本方面的主要聯絡人，又是內田良平。當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內派別林立。宋教仁在日本的活動如果取得成果，可以增強他的威信，否則反會授人攻擊口實，危及到宋教仁在臨時政府中的地位。與日本大陸浪人有着密切關係、被他們視為「親日派」^②的實力人物宋教仁如果被排除出權力中樞，是日本大陸浪人最不願意看到的結局。於是，北一輝和內田良平等人，為了能讓宋教仁不虛此行，進行了一系列緊鑼密鼓的活動^③。

1月29日，日本的國會議員、記者、律師等一百多人在上野精養軒聚會，要求日本政府在其它國家之前迅速承認「支那共和政府」^④。2月3日，北一輝再向內田良平以及有「日本政界黑幕」之稱的浪人領袖人物杉山茂丸^⑤等人發電，說明對於宋教仁之行，「孫逸仙的確也請求了犬養君給予幫助，然該君一直採取攻擊〔日本〕政府的態度，故孫氏也沒有抱太多期待。」^⑥其言外之意不外乎就是這次最主要還是要靠內田良平。

2月6日，北一輝再次以長電向內田良平等人強調宋教仁此次訪日之意義：宋教仁作為全權代表前往日本，可以一舉奠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親日派的扎實地位；為了日本的利益，有必要將此次功勞記在宋教仁身上。當時，各國為了爭取在華利益，不分南北，競相向清王朝以及革命黨人各方提供援助、供給軍隊及武器。而日本軍人和浪人在武昌起義時竟然貪污二十五萬元，此事招致武昌到處貼出禁止日本人入內的標語；而在進攻南京時，日本的商社甚至賣出已經成為廢鐵而無法使用的武器，以致社會輿論和臨時政府中的親美派再次拿出甲午戰爭時期的「日本觀」來攻擊親日派和日本。所以，大陸浪人強調，此次日本政府如果能夠抓住機會表明支援革命政府的態度，既能夠挽回日本的形象，也能夠幫助親日派在新政權內站穩腳跟、強化地位^⑦。

但是，杉山茂丸2月7日提出了宋教仁來日的三項條件，即必須具有臨時政府賦予的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的全權代表資格，不以日本政府之外任何人為交涉對象，不要求虛榮繁華的外交禮節^⑧。其言外之意，不外乎是既要宋教仁具有代表新政權做出最後決斷之權限，以便日本政府在談判時可以真正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同時又不承認宋教仁具有代表中國政府的正式外交使節身份，以免得罪清朝政府。

然而，2月12日清帝遜位。隨着形勢的驟變，內田良平次日給宋教仁直接發出電報，不再提出先決條件：「不僅承認問題，為了商議支那永遠安康之道路，請在時局解決以前緊急來日。」^⑨此電文內容抽象，但是卻透露出要求讓日方參與或參照日方意見決定清帝遜位之後中國未來道路的意思。杉山茂丸和內田良平的行為，顯然引起了孫中山等人的懷疑。孫中山提出：「如果得到承認，卻有難以保全領土之虞，就不進行和議。」^⑩在摸不清日本方面是否有藉機提出領土要求的情況下，宋教仁也決定推遲訪日^⑪。面對這種偷雞不成反蝕把米的局面，內田良平和黑龍會幹事小川平吉於2月20日分別向宋教仁發出電報，反覆申明「滿洲獨立只是一句虛言，已向當局認證，務請安心」^⑫。

事實上，從十九世紀末期直至辛亥革命發生前後，日本政府的中國政策與日本大陸浪人的活動之間有着一定的距離。儘管日本許多政治家對中國抱有侵略野心，但作為一國政府，日本政府不得不以當時的中國政府為交涉對象，因而日本政府在孫中山當初來日本進行革命活動時，曾經應清朝政府之請而設置

障礙，在辛亥革命之後也採取觀望態度而不肯立即承認中華民國，在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時也沒有主動拋棄袁世凱而採取支持孫中山一派的政策。然而，這在一部分日本人看來，從開始處理朝鮮問題時與清國發生衝突以來，「政府當局的外交方針總是因循姑息，缺乏為東亞全局而進行遠大經綸的氣魄」^⑧。因此就有了以「在野」身份考慮「東亞經綸」、進行「大陸經營」，以確立日本在東亞的主導地位，進而擴大日本「國權」為使命的「大陸浪人」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

大陸浪人的所謂「大陸經營」，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是「形似侵略而實非侵略」：日本與清、韓兩國之間的關係實為唇亡齒寒，如果兩國具有值得結為友邦的實力，共同抵禦歐洲列強侵略更好，但當今西力東漸年年加劇，鄰邦的支那和朝鮮自身已是「老朽將倒」，「清韓兩國遭到列強侵略之際，餘波必然威脅到我國的存亡」。為了防止這一情況的發生，不如由日本「喚起鄰邦覺醒，指導進行改善，在這些國家扶植我們的勢力以擴展我國國防線，從而達到保全東亞的目的」。也就是說，「大陸經營」實為一種通過納中國與朝鮮半島於日本的勢力範圍之中以及從歐洲列強侵略魔掌中「保護東亞不受侵略的不得已的做法」^⑨。這就是十九世紀末期以來許多日本人所提倡的「亞洲主義」的真髓。大陸浪人之所以敢於不知羞恥地稱自己為「東亞先覺志士」，就是來自於他們這種所謂的「東亞經綸論」。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家當時也常常以「志士」相稱這些大陸浪人。

大陸浪人在日本堅持「在野」的立場，卻對中國的政權更替抱有極大的興趣，並且拼命接近中國的政權中樞，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考察先覺志士的大陸經營論，構成其思想根底的毫無疑問就是熱烈的愛國心和民族的自信。」^⑩黑龍會的這段自我表白，不僅能夠說明大陸浪人「大陸經營」的性質，同時也能夠說明，大陸浪人知道只有通過主張日本國家利益的形式，他們才能夠以日本國家為後盾實現個人野心。日本的大陸浪人中，其實不乏抱有另闢蹊徑、在大陸實現個人野心之人，這也就是他們當初之所以能夠從「民權派」輕而易舉地變身為「國權派」的真正原因。比起與日本政府面和心不合的關係來說，大陸浪人與日本軍部的關係更為接近。他們的「大陸經營論」與日本軍部中主張侵略大陸的勢力不謀而合，大陸浪人的個人野心自然使他們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大陸的尖兵。

大陸浪人進行「大陸經營」的第一個對象是朝鮮半島。為了給日本侵略朝鮮製造藉口，內田良平等人與當時在朝鮮的浪人組織武裝集團「天佑俠」，在朝鮮製造動亂。1882年壬午兵變之後，大陸浪人感覺到：「要想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朝鮮問題，最終勢必進一步與支那發生衝突。……朝鮮被支那吞併意味着我國國防露出破綻，從結果上來說是阻塞了我國向大陸擴張的出口，不得不說是對帝國之大不利。」^⑪由於事件後日本在朝鮮的勢力仍然沒有超過清國，「讓先覺志士不能不深感憂憤」，熊本的宗像政、土佐的中江兆民、奈良的樽井藤吉、愛媛的末廣重恭等一起商議「對支方針」，並得到了福岡玄洋社社長平岡浩太郎和玄洋社精神領袖頭山滿的支持。頭山滿認為：「得到了大頭，小頭不勞自得；拿下了支那，朝鮮不招自來；與其與朝鮮衝突，不如直接料理支那。」^⑫

朝鮮問題最終引發了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簽訂後的三國干涉還遼令日本深感屈辱，開始以俄國為最大敵人，大陸浪人更是積極主張對俄開戰，其

大陸浪人的「大陸經營」實為一種通過納中國與朝鮮半島於日本的勢力範圍之中以及從歐洲列強侵略魔掌中「保護東亞不受侵略的不得已的做法」。這就是十九世紀末期以來許多日本人所提倡的「亞洲主義」的真髓。大陸浪人之所以自稱為「東亞先覺志士」，就是來自於這種「東亞經綸論」。

目的還是在於奪回日本當年在中國失去的權益，首當其衝的當然就是遼東半島乃至包括整個東北地區和內蒙東部的所謂「滿蒙」地區。

三 內田良平對中方針的變遷與「滿蒙」問題

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不久，孫中山在《民報》的發刊詞中，把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闡發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三民主義^④。孫中山使用的「民權」，可能與他接受日本的近代國家思想有着直接的關係。因為當時在國內，「民主」一詞已經被討論和使用，而孫中山此時所用的「民權」實際上也包含了「民主」的涵義^⑤，這樣我們就不得不考慮孫中山為甚麼捨「民主」而取「民權」來表示他對民主主義的追求。關於這一點，很多學者已從當時對各個詞彙涵義廣狹理解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探討，然而卻沒有人注意到與孫中山有所交往的日本人與「民權」之間的思想聯繫。

其實，「民權」也是一個近代日本自己發明的話語。孫中山在日本政界最主要的盟友犬養毅，實際上就是日本明治時期「自由民權運動」^⑥的代表立憲改進黨的創始人之一。日本大陸浪人的最重要母體玄洋社，最初就是一個以「要求民權」為口號而建立的政治性社團^⑦。大陸浪人中有很多原為武士階層（日語中稱「士族」）出身。士族在明治維新過程中被剝奪了特權，加上他們對明治政府中專制和腐敗的現象不滿，1877年爆發了由西鄉隆盛領導、以士族為中心的反對明治政府的西南戰爭（又稱「丁丑之亂」、「十年戰爭」）。戰爭失敗後，參加了西南戰爭或追隨西鄉隆盛的福岡士族，為了繼續與明治政府對抗，成立了玄洋社（1878年初名為向陽社，1881年改名為玄洋社），投入了自由民權運動^⑧。

但是，在當時處於國力上升時期的日本，國內追求民主的「民權」與對外爭取日本國家利益的「國權」，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互相對立的關係。關於這一點，可以從1880年時向陽社就曾發起建立「討清義勇軍」^⑨，改名玄洋社時又制訂了「敬戴皇室，愛重本國，固守人民權利」的三條綱領等事例上得到印證^⑩。由於明治政府1889年制訂了《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實行了第一次議會大選，使自由民權運動失去奮鬥目標。堅持走在野道路的玄洋社，將更多精力投向追求國權，由此催化了大量具有國權主義思想的「大陸浪人」的誕生。

孫中山不可能不知道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歷史，也不可能不清楚在這些人從民權主義者向國權主義者的蛻變過程中民族主義思想的催化作用。儘管孫中山日後解釋的「民權主義」內容，與日本當年的自由民權運動有着很大的差異，然而也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孫中山在選擇中國走民族國家道路的同時，在東京選擇了使用「民權」一詞沒有受到圍在他周圍的日本大陸浪人思想的影響。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陸浪人支持孫中山進行革命其實都有一定的目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將東北和內蒙古東部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之中。按照黑龍會日後的說法，清朝末年以來瞄準中國的日本大陸浪人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希望藉中央綱紀鬆弛、地方匪賊橫行之機，來到中國甚至不惜成為匪賊首領以開拓新天地之人；二是耐心等待中國國內出現叛亂，支持叛亂力量打

孫中山不可能不知道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歷史，也不可能不清楚在這些人從民權主義者向國權主義者的蛻變過程中民族主義思想的催化作用。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孫中山在選擇中國走民族國家道路的同時，選擇了使用「民權」一詞沒有受到日本大陸浪人思想的影響。

倒清朝政府並實現支那更生之人；三是認準「先下手為強，將遲早逃脫不了遭到歐洲這些虎狼之國侵略的支那拿到手中才為上策」之人^④。

黑龍會內田良平一派選擇的是第二種道路，因為「孫逸仙等來到日本為準備革命頻頻奔走時期，孫曾說過只要日本援助革命黨，革命成功之際支那為日本而讓出滿洲之類的話」^⑤。按照內田良平1927年的說法：「我們賭上生命援助孫的革命，是因為它與日本的利益一致。孫舉起的大義名分的革命旗幟為滅滿興漢，驅除滿人並建立漢人的中國。所以我們可以幫助漢人將滿人逼到不得不借助俄國力量的地步，然後日支合手打敗俄國，將滿洲和西伯利亞收歸我有，一舉打下大陸經營的基礎。」^⑥所以，黑龍會及其周圍的大陸浪人「期待隨着革命的成功而調整兩國關係、解決滿洲問題，因此才極大地援助了革命黨」。他們當時認為，孫中山「即使做不到像他所說的那樣放棄滿洲，至少也可以輕而易舉地達成協議，將該地區完全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從而排除威脅東亞不安的因素」^⑦。

出於這種考慮，辛亥革命發生以後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裏，內田良平一直主張日本要支持中國「保全領土」^⑧。1911年12月，他在黑龍會本部編輯的《內外時事月函》中發表〈支那改造論〉，指出日本政府爭取主動，由日本指導「改造支那帝國，建設新政府」的重要性。按照內田良平的說法，日本能夠幫助發生革命後的中國決定未來國家形式的，無非有三種方案可行：一是「保護滿清朝廷，鎮壓革命黨，改革現政府，保全清國」；二是「兩分支那，以黃河以北為滿清政府區域，黃河以南為革命黨政府區域，各自建設適合支那國情的政府」；三是「廢除滿洲皇帝，以革命黨政府取代滿清政府，建設一個新機軸的聯邦共和國」^⑨。

然而，第一方案即「清國保全案」雖然是歐洲列強之所望，然因滿清政府腐朽透頂實為最難實現；第二方案即「支那兩分案」只能是一時權宜之策，因中國具有追求統一和民族融合的歷史傳統，所以從消除內亂的角度來看並非是「東亞永遠之策」；第三方案即「實施聯邦共和案」，不僅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儒教傳統和國民性，還可以杜絕人種傾軋、動輒革命的禍根，促進吸收先進文明，因此日本政府應該「活用主動地位與主動勢力，讓列國贊成日本方案，完成解決支那問題的任務」^⑩。

〈支那改造論〉中有這樣一段對日本政府的警示，非常耐人尋味：「如果我國政府當局者依然採用因循姑息的手段，步列國尤其是俄德兩國的後塵，扶持老朽的滿廷，壓制革命黨，在北方就會失去帝國在滿洲的優越地位，在南方長江一帶就會喪失帝國已經到手的利益圈，而誤國家百年大計。」^⑪但是，內田良平為甚麼認為「保全清廷」就會使日本失去「在滿洲的優越地位」呢？反言之，內田良平為甚麼會暗示日本政府如果支持革命黨建立聯邦共和政府，就會能得到強化日本「在滿洲的優越地位」的效果呢？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是不是與他們所說的孫中山當年有關「滿蒙」的言論有關。

然而，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在了袁世凱手中，這使黑龍會和內田良平當初希望通過扶持親日勢力掌握政權而拿下「滿蒙」的如意打算完全落空。在他們看來，「第一次支那革命因為袁世凱的出現，其結果恰似播種下稻穀卻只收穫了稗子」。因為「老獪的袁世凱反而利用滿洲問題，提出同胞鬩牆就會被日本奪走滿洲，所以應該迅速停止內爭而一致對付日本，並以此點為契機壓制革命

1911年12月，內田良平發表〈支那改造論〉，指出日本政府爭取主動，由日本指導「改造支那帝國，建設新政府」的重要性。實施聯邦共和，不僅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儒教傳統和國民性，還可以杜絕人種傾軋、動輒革命的禍根，促進吸收先進文明。

黨達成了妥協，自己坐上了大總統的位置，使孫向日本的有志之士所承諾之事頃刻化為烏有，形勢已經變得難以順利圓滿解決滿洲問題」⁶⁶。出於在朝鮮問題上與日本打交道的經驗，袁世凱對日本抱有很深的戒心和反感，因此他也成為日本大陸浪人在辛亥革命發生後的主要防備和攻擊對象。他們堅決反對南北媾和，反對孫中山將政權讓於袁世凱，「一旦袁世凱左右時局，萬事皆休」⁶⁷。日本的大陸浪人，其實很清楚親日派掌握中國政權對於他們在中國擴張日本國權上的作用。

許多大陸浪人在辛亥革命以後，仍然對於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抱着很大的期待。內田良平日後公開提到，當年孫中山曾經親口對他說道：「原來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至革命成功之曉，即令滿蒙西伯利亞送與日本亦可也。」⁶⁸但是從前述孫中山反對以領土為條件換取日本政府承認一事來看，即使孫中山當年有過類似的發言或「承諾」，毫無疑問也只是一種為了尋求支持、以早日推翻滿清政府奪取政權的權宜之語。民國元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之後不久在一次與記者談話時，記者問：「滿蒙現狀若何？」孫中山回答道：「中國方今自顧不暇，一時無力控制蒙古。惟俟數年後，中國已臻強盛，爾時自能恢復故土。中國有四萬萬人，如數年以後，尚無能力以恢復已失之疆土，則亦無能立國於大地之上。余深信中國必能恢復已失之疆土，且絕不需要外力之幫助。」⁶⁹

許多大陸浪人在辛亥革命以後，仍然對於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抱着很大的期待。但是從孫中山反對以領土為條件換取日本政府承認一事來看，即使孫中山當年有過類似的發言或「承諾」，也只是一種為了尋求支持、以早日推翻滿清政府奪取政權的權宜之語。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知道在這段談話中孫中山為何只談起蒙古而沒有言及「滿洲」，但是仍然可以從中感知，在辛亥革命發生、尤其是就任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之後，孫中山在「滿蒙」問題上開始具有強烈的領土意識。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1913年春天開始逐漸改變他的對中國方針⁷⁰，很可能就與孫中山的這種態度有關。1913年7月，內田良平與1890年時已經開始策劃「滿蒙獨立」⁷¹而被稱為「滿洲建國先驅者」的川島浪速⁷²合流並結成了「對支聯合會」，開始着力推動分裂「滿蒙」的工作⁷³，這就是內田良平在〈對支私案〉、〈對支問題解決鄙見〉等提出分割中國方針的背景。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就是前述〈對支私案〉中有「欲於將來進一步扶持親日勢力，最妙的就是讓該黨中有德有力的黃興等成為新政府的首腦人物」的說法，認定國民黨中「有德有力」的不是孫中山，而是黃興，這是內田良平對孫中山態度發生轉變的最好註解。它說明，走到分裂「滿蒙」這一步的內田良平，已經不再認為孫中山值得日本扶植，因為孫中山在分割「滿蒙」予日本的問題上背信棄義。

內田良平在其1914年提交給日本政府有關部門的〈對支問題解決鄙見〉中，已經完全拋棄了他1911年12月在〈支那改造論〉中所提倡的保全中國領土、在中國實現聯邦共和的主張，公然提出「支那的共和政體將來必然成為實現日支提攜的一大障礙」，為了保證日本能夠對中國進行指導的地位，必須藉機「改變支那的共和政體為立憲君主制，以與日本的立憲君主制形式相統一」。〈對支問題解決鄙見〉中的中日兩國《國防協約私案》（即前文所述及「二十一條」的藍本），公然提出要讓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洲及內蒙古的優越地位，將統治權委託給日本」，同意日本拿回德國所佔領的膠州灣地區鐵道礦山及一切權益，同意租借福建沿海重要港口給日本建設海軍根據地，同意將改造陸軍和建設海軍事宜委託

給日本，同意一律採用日本兵器規格，甚至要求同意日本在中國發生內亂時有權向中國出兵^④。

為了迫使中國政府接受這個協約，內田良平還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這樣一個「帝國支援支那民眾要訣」：「促使以革命黨、宗社黨為首的各種具有不公平感覺的黨派四處起義，在中國國內陷入混亂狀態、袁政權土崩瓦解之際，我們從四億民眾中選擇擁立最有信譽最有名聲者進行支援，通過他實現改造政府和統一國家的大業，並由我國軍隊來恢復秩序，保護國民生命財產，因此〔讓日本〕得到人民悅服、政府信賴，這樣就能夠輕而易舉地達到簽訂國防協約的目的。」內田良平在〈對支問題解決鄙見〉中還說道：「革命黨即不平黨至今沒有起事的原因不外乎缺乏資金力量，因此我帝國只需在資金力量方面暗中假以援手，哪怕數量僅少，彼等自會一舉蜂起使其國內即刻陷入混亂狀態，確為一件易事。」^⑤這一點，應該是內田良平在他長年與中國革命黨人打交道中所得出的真實體會。

不僅是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等許多辛亥革命的領袖，都和日本大陸浪人發生過種種聯繫，都曾經得到過他們的有力支持。應該說，直到今天發現的各種歷史文獻資料，還不足以證明這些革命領袖當年的確向日本的大陸浪人做出過割讓領土的正式承諾^⑥。然而，即使如此，為甚麼內田良平等日本大陸浪人會從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滅滿興漢」的思想脈絡中強調他們從中國分裂「滿蒙」的合法性？這一點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

四 結論

筆者向來認為，比起中國與歐美的關係，中日關係對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發生了更直接和更大、更強烈的影響。其中最具有代表意義的，就是中國近代革命家從日本學到了建設「民族國家」的思想。這一點，也是從努力追求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之外的國家所無法學到的地方。日本追求單一民族國家的歷史經驗，造成許多日本國民也相信自己具有其他國民所無法比擬的民族優越性，因而大言不慚地說指導東亞以不受歐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職、日本具有拯救東亞的使命。但是，這種所謂的「亞洲主義」與日本的國權主義思想之間存在着一種天然的聯繫，包裹在亞洲主義中的民族優越感必然不斷膨脹，最終導致日本逐步走向一個侵略國家並走向自毀道路。本文利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當年外交文書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藏當年軍事文書，以及當事者當年的敘述資料，從日本「大陸浪人」與一百年前發生的那場中國革命之間關係的角度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辛亥革命發生之前，由於革命黨當時處於非法地位，所以支持中國革命家活動的多為日本在野人士，而其中當然又以將自己政治活動的舞台主要定位於中國和朝鮮半島的大陸浪人為主。「民族國家」的思想不可能是大陸浪人的發明，但卻是造成他們個人野心不斷發酵的觸媒。縱觀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所作所為，能夠發現他們心中都有一種盲目的日本民族優越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等革命家是為了推翻滿清王朝才追求民族國家，而日本的大陸浪人

〈對支私案〉中認定國民黨中「有德有力」的不是孫中山，而是黃興，這是內田良平對孫中山態度發生轉變的最好註解。走到分裂「滿蒙」這一步的內田良平，已經不再認為孫中山值得日本扶植，因為孫中山在分割「滿蒙」予日本的問題上背信棄義。

孫中山等革命家是為了推翻滿清王朝才追求民族國家，而日本的大陸浪人卻是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革命家追求民族國家的意義。他們從「滅滿興漢」和「驅除韃虜」口號中看到了一種將中國的東北和內蒙古等地區從中國分割出去，最終納入進日本勢力範圍的契機。

卻是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革命家追求民族國家的意義。那就是，他們從革命家提出的「滅滿興漢」和「驅除韃虜」口號中看到了一種將中國的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甚至西藏地區從中國分割出去，最終納入進日本勢力範圍，甚至變為日本領土的契機。

在圍繞於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領袖周圍的諸多日本大陸浪人中，即使有一部分可能沒有像內田良平那樣直接表露出對擴張日本在中國勢力範圍的興趣，但是從他們與內田良平一直都能夠互相配合默契進行活動上，可以看出他們不可能不清楚黑龍會支援中國革命的最終目的。從各種文獻中也可以看出，孫中山等革命領袖當年也並不是沒有察覺到日本大陸浪人的這一動機，也許是認為必須真正實施「滅滿興漢」和「驅除韃虜」，也許是為了得到支援以便早日達到推翻滿清政府、奪取政權的目的，他們從來沒有對大陸浪人的這一想法進行正式批評，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民權、政權、國權，孰重、孰輕？在中國革命家和日本黑龍會那裏會有不同的理解；敵乎、友乎？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價值判斷中必然發生變異。這些看來似乎讓今人難以接受的歷史，讓我們不得不再次深思民族國家思想出現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利弊。

註釋

① 參見王柯：《走向民族國家——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思想誕生的國際背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② 參見王柯：〈「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民族學與社會學通訊》，2010年第70期，頁1-12。

③ 所謂「浪人」，原指離開了自己所屬藩到處流浪的武士階層。到了幕府時代末期，浪人出於改變自身地位的目的，積極參加各種政治活動，此時一部分出身平民的人也開始自稱浪人。而這部分浪人之中，此後將自己政治活動的舞台主要定位於大陸（主要為中國和朝鮮半島）的人，就成為所謂的「大陸浪人」（又稱「支那浪人」）。下文還將述及，大陸浪人力圖通過自己的活動，用自己的政治理想來影響日本的外交政策，其中許多人具有日本國家主義的思想，支持日本對外擴張。

④⑥ 內田良平：〈對支私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外務省記錄，1門政治，1類帝國外交，2項亞細亞，《支那政見雜纂》，第二卷8，B03030272300。

⑤⑧⑨ 內田良平：〈對支問題解決鄙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外務省記錄，1門政治，1類帝國外交，2項亞細亞，《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15，B03030268800。

⑦ 葛生能久：〈支那革命の端緒と日支志士の提攜〉，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冊（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頁617-22。

⑩⑪ 段雲章編著：《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29-40；40。

⑫ 花田仲之助日後在日俄戰爭以及日本侵華戰爭中協助日本軍部在中國東北地區進行了大量活動。具體可參見王柯：〈日本侵華戰爭與「回教工作」〉，《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頁92-93。

⑬ 葛生能久：〈臥薪嘗膽と入露の人々〉、〈浦潮方面における我が志士及び軍人の行動〉，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冊，頁569-86、587-604；頭山滿、犬養毅、杉山茂丸、內田良平：《玄洋社と黑龍會：あるいは行動的アジア主義の原點》（東京：書肆心水，2008），頁279-311。

⑭ 參見西尾陽太郎解說：《硬石五拾年譜：內田良平自傳》（福岡：葦書房，1978），頁51-52；段雲章編著：《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頁40。

⑮ 葛生能久：〈惠州事件の前後〉，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冊，頁651-52。

- ⑬ 葛生能久：〈對露問題と黑龍會〉，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冊，頁678-79。
- ⑭ 司法省刑事局：《國家主義乃至國家社會主義團體輯覽》（「思想研究資料」特輯第3號），上卷（京都：東洋文化社，1976），頁37-39。
- ⑮⑯ 藤本尚則：《巨人頭山滿翁》（東京：政教社，1923），頁509；520-21。
- ⑰⑱ 葛生能久：〈支那革命黨の搖籃時代と日本志士〉，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冊，頁377；363-81。
- ⑲ 原名北輝次郎，當時電文中多使用喜多輝次郎的名字，日語中喜多輝次郎與北輝次郎讀音相同。
- ⑳ 〈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十五分東京發，上海豐陽館宮崎宛，內田良平出〉，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8)，C08041018300。
- ㉑ 原口要(1851-1927)，日本最早的工學博士，鐵道設計者，後被孫中山邀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財政顧問。
- ㉒ 〈十二月十二日午前十時五十分東京發，上海松崎ホテル喜多輝次郎宛〉、〈十二月十二日午後六時十分上海發，東京麻布內田良平〉，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8)，C08041018300。
- ㉓ 〈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三十分東京發，上海松崎ホテル喜多輝次郎宛〉、〈一月二十五日午後十時十分上海發，東京麻布內田良平〉，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4)，C08041018900。
- ㉔ 〈一月二十五日上海發，東京內田良平宛〉、〈一月二十五日午後十時四十五分上海發，東京水明館梅村ゴク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4)，C08041018900；〈一月二十六日午後零時五分東京發，上海松崎洋行喜多輝次郎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5)，C08041019000。
- ㉕⑶ 〈二月六日午後八時五十分上海發，東京麻布內田良平、東京京橋杉山茂丸、政友會本部小川平吉、東京青山末岡タケタリ、東京原宿有賀文八郎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7)，C08041019200。
- ㉖ 〈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七時四十分上海發，東京麻布內田良平、青山有賀文八郎、青山末岡タケタリ、京橋杉山茂丸宛〉、〈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四十分東京發，上海松崎ホテル喜多宛〉、〈一月二十七日午前十一時十分上海發，東京麻布內田良平、青山有賀文八郎、青山末岡タケタリ、京橋杉山茂丸宛〉、〈一月二十八日午前九時二十分東京發，上海松崎洋行喜多輝次郎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5)，C08041019000。
- ㉗ 〈一月二十九日午後九時東京發，上海ミンリツホ氣付，南京共和政府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5)，C08041019000。
- ㉘ 頭山滿、犬養毅、杉山茂丸、內田良平：《玄洋社と黑龍會》，頁24。
- ㉙ 〈二月三日午後六時四十分上海發，東京麻布內田良平、青山末岡タケタリ、京橋杉山茂丸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6)，C08041019100。
- ㉚ 〈二月七日午後三時五十五分東京發，上海松崎ホテル喜多〉，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7)，C08041019200。
- ㉛ 〈二月十三日午前十時五十五分東京發，南京宋教仁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7)，C08041019200。

- ③③ 〈二月十四日午後十時上海發，東京牛込仲町千早正二郎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8)，C08041019300。
- ③④ 〈二月十七日午後十時上海發，東京麻布内田良平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8)，C08041019300。
- ③⑤ 〈二月二十日東京發，上海松崎洋行宋教仁、喜多宛〉、〈二月二十日東京發，上海松崎洋行宋教仁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9)，C08041019400。
- ③⑥③⑦③⑧③⑨④④④ 葛生能久：〈對支活動の先驅〉，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冊，頁310；311-12；309；309；310；312。
- ④① 孫文：〈發刊詞〉，載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77)，頁81。
- ④② 桂宏誠：〈孫中山的「民權」、「民主」及「共和」之涵義〉，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研究報告，內政(研)095-002號，2006。
- ④③ 自由民權運動(1874-1890)，主要主張為制訂憲法，開設民選議會，減輕地租，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
- ④④ 1913年3月，孫中山還到福岡親自瞻仰了玄洋社墓地。
- ④⑤ 井川聰、小林寛：《人ありて：頭山滿と玄洋社》(福岡：海鳥社，2003)，頁44。
- ④⑥ 石瀧豊美：《玄洋社發掘：もうひとつの自由民權》(福岡：西日本新聞社，1981)，頁22-26。
- ④⑦ 玄洋社社史編纂會編：《玄洋社社史》，復刻版(東京：明治文獻，昭和41年〔1966〕)，頁223-25。
- ④⑧④⑨⑤⑥ 葛生能久：〈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冊，頁318。
- ④⑩ 西尾陽太郎解説：《硬石五拾年譜》，頁77。
- ④⑪ 内田良平：〈分割乎保全乎：對支那大陸の根本政策問題〉，《太陽》，大正二年(1913)，第19卷第2號，頁99-101。
- ④⑫④⑬④⑭ 内田良平：〈支那改造論〉，《內外時事月函》，明治44年(1911)12月號，頁20；21-26；27。
- ④⑮ 〈二月十日東京發，南京宋教仁宛!! Songchouyen〉、〈二月十日東京發，上海Torajo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海軍省公文備考類(11)戰役等，清國事變(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國事變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7)，C08041019200。
- ④⑯ 孫中山：〈中國若無能恢復已失之疆土則亦無能立國於大地(民國元年春在南京與報館記者談話)〉，載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1960)，頁496。
- ④⑰④⑱ 初瀨龍平：《傳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80)，頁172；173。
- ④⑲ 葛生能久：〈川島浪速の支那渡航と最初の滿蒙建國計畫〉，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冊，頁242。
- ④⑳ 葛生能久：〈滿洲建國の先驅者川島浪速〉，載《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冊，頁212。
- ④㉑ 藤井昇三：〈孫文と「滿洲」問題〉，《關東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昭和62年(1987)第52號，頁41-51。該論文是日本至今為止，就「孫中山在『滿洲問題』上，從革命開始初期到1918年為止，對日本採取了相當妥協的態度」之事利用各種史料進行論證最為深刻的論文，其中最為重要的證據是一些日本人之間的電報往來，其中有就日本租借「滿洲」一事孫中山的並不十分明朗的口頭應允，但沒有顯示孫中山的任何親筆文字。